

在「一個國家」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激盪中成長-----

從公民社會模式看澳大利亞華人的參政空間

楊聰榮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歷史學部歷史學博士候選人)

論文發表：「邁向二十一世紀海外華社之變遷與發展：市民社會探討」國際學術研討會，1999年5月29日，台北。主辦：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會。

論文出版：<<在「一個國家」和「多元文化主義」的激盪中成長-----從公民社會模式看澳大利亞華人的參政空間>>。陳鴻瑜主編<邁向二十一世紀海外華人市民社會之變遷與發展>，台北：中華民國海外華人研究會，1999年8月。頁142-179。

目次

- 一．前言：九十年代澳洲華人的危機與轉機
- 二．從公民社會理論看移民的政治參與：海外華人的視角
- 三．澳大利亞多元移民社會的組成與華人社群的結構
- 四．「一族黨」的興起對多元文化主義的衝擊與華人社群的反應
- 五．結語：澳洲華人參政現象對華人研究的可能意義

前言：九十年代澳洲華人的危機與轉機

在一場澳洲學者專為寶琳·韓森(Pauline Hanson)現象而辦的學術研討會上,幾位學者表示,寶琳·韓森與「一族黨」(One Nation Party, 更貼切的翻譯應是「一個國家黨」或是「單一民族黨」,這裡採用比較通俗而普遍的譯法)的興起是澳大利亞政壇自廢除白澳政策以來最重要的政治現象¹。對於澳洲華人而言也是如此,如果說廢除白澳政策改變了澳洲華人的口組成,那麼「一族黨」的興起則引發了澳洲華人政治參與的熱潮。「一族黨」反對亞裔移民的言論被認為是澳大利亞採行文化多元主義最大的挑戰,對於華裔社群來說原本是一場危機,這種危機感引發了澳洲華人的參政熱潮,卻是新的轉機的開始。自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在短短的時間內,澳洲華人社群主導了一個多元族群政黨的成立,分別在1998年聯邦大選以及1999年新南威爾斯州大選中推出十多位華裔參選人,和過去澳洲華人默默耕耘而不熱衷政治的現象大異其趣,成果也相當可觀,現在新南威爾斯州出現三位華裔參議員,墨爾本市的副市長也由華裔擔任,如此澳大利亞兩大埠雪梨和墨爾本都先後分別出現華裔副市長,這對1988年才出現第一位州級以上參議員的澳洲華裔社群而言²,是始料未及,難以想像的成果,因此澳洲華人參政現象成為各地海外華文報刊相關報導的焦點³。本文將以此現象做為分析的起點,從前因後果來討論澳洲華人的參政空間,以及這個現象本身所包含的可能意義。

華人移民以及其後裔是否能在當地國參政⁴,向來是當地華人社區關

¹ 會議中多位學者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同樣的意見,參見 Robert Manne, "Foreword" In Robert Manne ed. *Two Nation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Rise of the One Nation Party in Australia*. Melbourne: Bookman Press. 1998. Pp.: 3-9. Greg Sheridan "Pauline Hans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ustralian Dream." 同書, Pp.: 169-170.

² 第一位澳洲華裔成為州級以上的議員應屬何沈慧霞(Helen Sham-Ho), 1988年3月成為新南威爾斯州參議員,隨後在南澳州的余瑞蓮醫生在1990年11月當選南澳州議會參議員,第一位晉身聯邦議會的澳洲華裔應為劉威廉,1990年成為聯邦參議員。可以說州級以上華裔民意代表的出現,是十分晚近的現象。

³ 例如亞洲週刊第41期(1998年10月18日)報導,以「澳華人告別百年孤寂」為標題來說明這一現象,並且表示「澳洲華人在大選中成為關鍵少數,展現前所未有的團結。華人移民數增加,在政治及藝術、文化領域漸露頭角,融入主流社會,逐漸擺脫封閉積習,積極爭取權益,遏制種族主義逆流。」,賦予超越政治領域的意義。

⁴ 在本文中「華人」與「華裔」將交互使用,視上下文脈而定,而不做區分,這是因為在澳大利亞有許多華人家庭曾經多次遷移,最後才來到澳大利亞,區別誰是移民誰是移民後裔沒有多大意義。

注所在，也是各地華文報刊都感興趣的題材，華人移民在當地國的參政不僅僅被認為是華人從政者個人的成就，也被視為一個地區華人社群整體政治地位的表徵。本文將以澳洲華人的個案，從公民社會的角度來討論華人參政現象⁵，以做為理解當代各地華人社會的參考座標。文中建議在討論各國華人參政現象，首重各地的基本條件的差異，如人口結構、人口分布、政黨組織與國家體制等的不同，乃至於歷史發展的變遷過程，都是影響各地華人參政的重要因素，此外仍可從少數族裔在公民社會的發展空間來比較各國華人的參政現象，即由少數族裔參政在公民社會的不同參與層次的質的比較。由此角度觀察九十年代的澳洲華人參政現象，可發現參政熱潮除了參選和當選之量的增加之外，還有更積極的義意，澳洲華人參政可視為以公民社會的邏輯，和政治社會進行有效地互動與對話，從而讓主流社會調整心態，重新肯定文化多元主義，尊重族裔社區的意見。對各地華人參政的現象而言，能夠達到這個層次的參與是澳洲華人熱潮的最重要的意義。

從公民社會理論看移民的政治參與：海外華人的視角

為了使和華人參政問題及公共參與等相關問題的討論，得以結合一般華文媒體的興趣及學術研究的討論，以及將議題放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提供討論各國華人社會的架構，先對幾個經常出現在華文報刊的觀念加以分析，以下分別討論「政治參與」和「公民社會」兩組觀念，將其放在移民社會中的少數族群的討論脈絡，把華人參政問題帶入，然後再討論澳洲華人的參政現象。

首先討論「公共參與」與「參政」，公共參與是指對社會成員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參與範圍可以十分廣泛，從公共事務的意見表達、決策、執行與資源分配都包括。參與有不同層次的參與，可以是主動的參與，也可以是被動的參與，以移民社會的討論而言，一般是指的是主動參與，而非因為居住在當地而被動參與⁶，主動參與的方式很多，從個人對社區事務的意見表達到組織性地參與公共事務都

⁵ 對於澳洲華人最近的參政現象，本文主要取材自澳大利亞的華文報刊，主要原因是這段期間澳洲華文報刊的報導重點和輿論焦點都集中在這方面，但是在英文報刊上卻少有相關報導，即使有相關報導也不會將華人議題特別標示出來，這是因為英文報刊必須反應主流價值，也必須照顧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近年來幾次選舉的各種報導中，並未曾特別關照華人參政現象。

⁶ 例如澳大利亞是採取義務投票制，即每個屆齡公民有投票義務，必須參與投票，否則會受到罰金處分，因此和其他地區華人一般情況投票率偏低的情況不同，雖然投票本身即是公民對公共事務參與最重要的方式，但是在澳洲華人的例子中，我們必須討論更為積極的方式。

是。移民是否熱心參與公共事務，各族裔差別很大，一般說來，移民社群投入公共事務參與的程度比較低，除了生活適應等問題之外，還有受到移民來源地的政治文化的影響，這可能是一般亞裔社區對公共事務投入較少的原因之一。然而公共參與是政治參與的基礎實力所在，成員平時要有廣泛而深入的公共參與，少數族裔在參與政治時才易於被接受，也才能動員必要的資源。

公共參與表現在政治層面上，是為政治參與。政治參與的管道很多，最基本的是投票，還有其他的政治參與管道存在，如從事公務員、參與遊說團體、參加政黨、協助籌款乃至於協助競選活動等都是，直接從政祇是其中一種參與方式，即以爭取政府職位或民意代表等政治職務的公共參與方式，這種參與方式則直接涉入政治運作的機制與權力的分享，且其外顯性最高，對任何少數群體而言都是最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參與方式。

公共參與對於移民而言格外重要，移民來到當地國(或稱居住國)，不僅在數量上來說是少數，在公共參與上因不諳當地習慣，未必能被當地人接受，或是因為移民社群的自我保護性格，一般在公共參與的程度上總是比當地人低得多，因此在公共事務決策的影響力較小，這種情況不利於移民社群，不論就移民社群溶入當地，為當地社會所接受及尊重，或是最起碼的保障移民社群的權益都是不利的。鼓勵移民多從事公共參與工作，對於該社群在當地的形象及實質影響力都有莫大的提昇，然而受到主觀及客觀的因素的影響，移民的公共參與有一定的侷限，這是所謂的公共參與空間的問題⁷。

政治參與則涉及實際的權力運作關係，是否投入政治參與對移民社群影響很大。從政治學理而言，投票即是公共意見的表達，可以反映不同群體的利益，但是實際上移民的群體利益，未必能在選票中合宜地反應出來，同樣是受到許多主客觀因素影響⁸。客觀因素包括

⁷ 以具體實例而言，各國都有某些領域，華人參與的空間很低，或是受到有形無形的限制。例如在馬來西亞擔任警察以及軍人的華人遠低於人口比例，在印度尼西亞的公務人員也很少有華人得以在其中發展，在美國過去華人子弟要成為新聞主播是難以想像，後來宗毓(Connie Chung)才打破了這個禁忌，然而一般而言，華裔要成為娛樂界及文化界的公眾人物，空間仍是相當有限。在澳大利亞也有類似的情況，過去在娛樂界及文化界的公眾人物中幾乎沒有華裔的身影，後來Annette Shun-Wah開了頭，給其他對相關工作有興趣的華裔相當大的鼓勵，詳見Annette Shun-Wah “Being Chinese in Australia: A Personal Journal” Imagining The Chinese Diaspora: Two Australian Perspectives. Canber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ANU.

⁸ 有關移民的政治參與的討論有相當多的文獻，但在澳大利亞，對移民社群的政治參與的討論文獻極為有限，主要是政府部門的報告，參考James Jupp, Focused study on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n Govt. Pub. Service, 1989.

法律上對移民的限制、人口的比例、選區的劃分、選民的分布甚至是選舉制度等等，都是決定移民投票是否具有影響力的最基本條件，由於移民通常是少數民族，而投票選舉則是多數決，移民的影響力不容易直接反映在選票上。而主觀因素包括移民來自民主政治文化較不發達的地區、移民對當地政治參與不熱衷、投票率偏低、不喜歡公開表達意見、擔心意見和主流意見不合會有不良後果等等，也都會影響到移民社群的投票行為所反映的意見及影響力。除了投票以外，這些主客觀因素也會影響移民社群的其他政治參與方式，而傾向尋求特定的政治參與方式，如華裔社群所熟悉的競選籌款活動，或以尋求支持主流社會中特定代理人為其群體利益發言。

一般而言，各地華人移民在投票行為中所反映的意見及其影響力，經常是少於華裔社群中的人口比例，或是和特定的少數意見團體相比相形見拙⁹。華人從事公務員、參與遊說團體、參加政黨、協助籌款乃至於協助競選活動等等多有所聞，這些幕後型的政治參與很重要，是政治實力的基礎，然而最受矚目，還是有華裔人士直接投入公職的競選活動，因為經過公開競選之後而得到當選，代表受到當地社會的接受，其成就不僅是個人的成就，也被視為代表華裔族群的榮耀，對於移民社群的地位及形象都有正面積極的作用，一般討論的華人參政，是指華裔人士直接投入公職的民主競選為主。

然而當少數族裔代表投入主流社會的民主競選時，立刻浮現出競選人和主流社會的關係的問題，因為民主競選是數人頭，數人頭則是多數族裔佔優勢，即使選舉的議題導向不一定涉及族裔問題，也必須考慮主流社會的傾向與偏好。除了參與選舉要涉及主流社會的價值取向之外，少數族裔代表到底以什麼立場參選也成為問題，即必須考慮是否加入主流政黨，是否和其他勢力結合，是否專門關注少數族裔問題，還是也要關注其他主流社會關心的各種問題，在考慮和主流社會關係的同時，也必須考慮在少數族裔社區的接受程度，尤其是在少數族裔社區內部分歧性很高時，如何整合不同支持勢力的平衡，都是少數族裔代表經常面臨的課題。

由於主客觀條件的不同，各地華人政治參與現象是難以比較，相關討論必須將各地區的主客觀條件先討論清楚，然而在各地華文媒體

⁹ 考量各個華人移民較多的國家，這樣的陳述大致可以成立，在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華人選票的影響力小於其人口比例，而在美國、加拿大、紐西蘭等移民國家，華裔選票的影響力也比不上特定的少數族裔或是意見團體。

爭相報導各地華人參政現象，相當於在「華人跨國公共領域」中因為資訊的流通而不斷使讀者產生比較性的聯想¹⁰。為了協助我們對各地華人政治參與現象具有比較研究的基礎，必須引入「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理論，因為要將華人政治參與現象放到當地國家的脈絡來討論，則必須討論社會的性質及與國家的關係。

「公民社會」是政治社會學的專有名詞，隨著學術界採用相關理論來從事幾個不同華人社會的研究¹¹，也經常在各種華文報刊出現。雖然提出公民社會的論者很多，各有不同的說法，但是「公民社會」在近代西方的討論脈絡是提出來和「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相對稱，公民社會是指超乎個人或者家族等原初性連帶關係的群體組織關係及人際關係所構成的空間，政治社會是由政治權力的組織法則所形構的空間，如果以現代國家的政治形態來討論，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關係相當於社會與國家的關係，兩者關係密切，然而如果要形成健全良好的公民社會，則必須考慮雙向的互動關係，一是社會型塑國家的過程，即政治社會化，把社會關係的意旨反應到政治的安排之上，反向的關係是國家型塑社會的過程，透過國家的有效介入來維持公正規範，實現社會正義¹²。

公民社會有公民社會的邏輯，因為公民社會中存在各種集團與組織，各有各的旨趣及利益，良好健全的公民社會應該給予自由的空間，讓各種集團和組織互動，追求各自的目標和利益，不應該受到

¹⁰ 這裡借用龔宜君論全球華人網路的名詞「華人跨國公共領域」來指稱各地華文報刊的論述所構成的公共空間，各地華文報刊有論述其他地區華人相關新聞的傾向與傳統，這個論述空間似乎可以說早在 1930 年代因各華埠聯合籌款活動時已經儼然成形，隨著海外華文報刊的勃興而使這一論述空間更為明顯。有關「華人跨國公共領域」的討論，詳見龔宜君 全球化下華人跨國公共領域的形成：印尼風暴後全球華人網路動員的意涵 《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1998，第五期。關於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討論，參考 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 in association with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¹¹ 以公民社會理論模型來從事華人社會研究，在中國本土為研究對象已經有了相當的成果，例如 Philip C. C. Huang, “‘Public Sphere’ /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Third Realm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Modern China*, 1993, 19(2). Timothy Brook and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Wang Miaoyang, Yu Xuanmeng and Manuel B. Dy eds., *Civil Society in a Chinese Context*. Washington: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1997. He, Baogang, *The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William T. P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1993, 19(2). 但是以所謂海外華人社會為研究對象則還不多見。

¹² 關於在西方社會傳統的公民社會理論，參考 Robert Fine and Shirin Rai eds., *Civil Society: Democratic Perspectives*. London: Portland, 1997. Jean L. Cohen and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政治社會的權力邏輯的影響而導致發展空間被壓縮，但是公民社會也須要國家介入，制定公平的程序、規則及規範，由國家從法律上加以確認及保障，才不致使各種不同身分、階級、組織等因為自身利益而破壞其他人的利益，同時政治社會也有政治社會的邏輯，如果政治社會萎縮，對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有問題，反而會使得社會缺乏制度化及程序化的機制，同時也易於導致社會的全盤政治化，同理健全的政治社會也必須吸納公民社會的需求，把各種集團及組織的利益合理地反應在政治的安排，因此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的良好互動對於形塑一個良好的公民社會是極為重要的¹³。

回過頭來以這個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的互動模式來看華人參政問題，華人參政爭取少數族裔的權益，可視為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的一環，即以認同為核心的，但在公民社會中要求承認差異的社會運動¹⁴，華裔人士做為移民社會的少數族裔，不論是少數族裔集團推出的代表，還是主流政黨安排的少數族裔代表，一但被認知為少數族裔，即反應公民社會中的特定集團的利益，而參選本身則意味著公民社會的特定集團的利益如何在政治社會中呈顯。因此華人參政問題，做為少數族裔參政課題的相互比較，應該放在參與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互動過程來討論，在此把華人參選的情況分為幾個層次，在這幾個不同層次中做質的分析，而不是量的討論。

第一個層次是在參選，少數族裔能否有機會參選已經在某種程度反應出一個國家的公民社會健全與否，能不能有足夠的空間讓少數族裔參與政治，如果連參與競選的可能性都很小，表示這個公民社會的空間被主流政治勢力滲透壓縮到連保障基本權利都不可得，可否參選牽涉及不同程度的限制，除了法制上的限制以外，還有心理上的限制，在一般的情況下，如果沒有當選的可能，也會阻礙少數族裔參選的可能¹⁵。

¹³ 關於不同身分的社會群體如何在公民社會的模式中和國家及社會中的其他集團互動，詳見 Craig Calhoun ed.,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Oxford: Cambridge, 1994. 其中少數族裔爭取權益的運動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¹⁴ 關於新社會運動在公民社會模式中的實踐，詳見 Enrique Larana, Hank Johnston, and Joseph R. Gusfield eds.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¹⁵ 例如過去在印度尼西亞，有任何華人特徵的人士都無法有參與政治競逐的機會，是政治社會壓迫公民社會的實例，在泰國及馬來西亞都有以重要政治人物有華裔血統(或可能有)而被對手攻擊，可見當地仍未能平等見容各族裔參政。同一個國家在不同層級的職位競選也有不同的情況，如對美國華人而言，競逐州長不再是不可想像的事，至少有駱家輝為前例，但是華裔人士競逐總統仍是難以想像。就這一點來說，澳大利亞到現在仍然沒有華裔人士競逐州級行政首長，但

第二個層次是參選者是代表單一族裔利益，還是可以結合不同的集團利益，少數族裔人士參選，如果祇是做為單一族裔的代表，意味著在公民社會的互動中，是以原初性的連帶關係為動員力量，這樣的公民社會雖然也可以反應部分社會集團的利益，但是也意味著少數族裔將維持少數族裔的支持，優勢集團贏得優勢的局面，少數族裔則沒有機會透過公民社會的機制反應其意見及旨趣，對於公民社會中的各族裔之間的溝通對話並沒有幫助。過去部分亞洲國家的華人社會即反應出這種情況，即是公民社會未臻成熟的表徵。如果能夠結合不同集團勢力的支持，代表這個公民社會間不同利益可以互相折衝協調，產生新的社會關係和旨趣，是公民社會成熟的表徵¹⁶。

第三個層次是當選與否，對少數族裔代表而言，能否當選可表徵政治社會對於公民社會少數集體勢力的吸納與呈現，當選即表示參與到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的互動過程，透過制度性的機制，將公民社會的議題帶入政治社會，而參與公共決策的過程又可形成公權力反饋到公民社會。對於少數族裔而言，是否有合乎比例的代表當選公職一直是討論少數族裔參政的重要依歸，然而重點並不是當選公職的比例是否反應少數族裔的人口比例，而是當選公職是否可以扮演聯繫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機制，如果祇是將少數族裔代表視為政治上的花瓶的角色，做為裝飾，聊備一格，則仍然是表示其公民社會的機制不健全¹⁷。

第四個層次是參政過程中是否對於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的互動關係中產生良性的影響，許多時候少數族裔參與政治競選，祇能接受既有的遊戲規則，既有的遊戲規則通常已經隱含了主流政治集團的宰制力量。如果少數族裔參政，不單是接受主流政治勢力的權力邏輯或是價值觀，而是進一步希望和政治社會的權力邏輯產生對話，溝通不同的價值觀，從而在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相互形塑的過程中形

是參加國會議員大選在九十年代則成為平常之事。

¹⁶ 例如美國華裔參選時，經常得到其他亞裔人士，或是主流社會的協助，即是在公民社會中族裔互動的結果。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也有同樣的情況，如果華裔參選無法突破華裔社群的選民支持範圍，以選區內的人口比例來看，在大多數的情況是無法當選。

¹⁷ 根據一項比較研究顯示，澳大利亞做為一個以移民為主所構成的國家，具有不同族裔背景的民意代表明顯地比其他移民國家要少，這項研究是比較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五國之國會議員是海外出生者的比例而得出的結果，詳見 未獲政黨分配安全議席，移民黨國會議員比率低 《澳洲新報》1999年3月13日。

成新的價值與運作原則，才能改變既有的政治社會和公民社會交互運作的邏輯，在形塑新的公民社會空間的過程中加入新的元素。這是少數族裔在公民社會中政治參與的最佳境地，才是少數族裔突破政治弱勢宿命的理想程序，這種貢獻及影響才是可長可久。

這四層次的政治參與架構可以用來比較各國華人參政現象，這種比較不是以量化的方式來衡量，而是以質化的形式要件為衡量。由於各國的基本條件差異很大，華人社群在當地的情況也各不相同，如果要討論各國華人的參政情況，必須先瞭解這些基本條件的不同，以下先描述澳洲社會的基本性質以及華人社群的結構，然後再述及九十年代澳洲華人參政的發展，以求對現況的理解有較具動態發展的背景，最後再以這個四個層次的分析架構來評估澳洲華人的參政空間。

澳大利亞多元移民社會的組成與華人社群的結構

澳大利亞是個以移民為主所構成的國家，並且號稱是多元移民所構成的國家，移民來自世界各國，除了現在被稱為「澳洲原住民」(Australian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其他都是後來的移民，因此理論上移民祇有先來後到的區別，不應區分誰是主人誰是客人，但在實質上卻非如此，澳洲經過英國白種人後裔為主的移民的開墾一百多年之後，才以聯邦的型態獨立建國，所以國家體制已經定型之後才有各地的移民大規模移入，所以澳大利亞有個清楚的主流社會，是以英式的文化為基底，經過在澳大利亞這種塊土地的淬煉而產生的所謂的澳式風格，後到的移民則都有機會體認這種澳式風格，並且認知主流社會的存在¹⁸。

澳大利亞是個以歐洲白種人移民，尤其是英國移民為主所組成的國家，此外澳大利亞原住民和非白種人移民也是重要的組成成分，而非白人移民則以亞洲人最為顯著。澳大利亞的白種人移民從未間斷¹⁹，除了來自英國和紐西蘭的移民持續成為最主要的移民之外，其他

¹⁸ 在澳大利亞的報章及學術論文中經常用到 mainstream society (主流社會), mainstream parties (主流政黨), 都是假定這個主流社會的存在。就澳洲國家政策的決策過程而言，主流社會的存在是很清楚的，和移民社會有相當的距離，詳見 Michael Wooldridge, "A Pathology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Robert Manne ed. Two Nation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Rise of the One Nation Party in Australia. Melbourne: Bookman Press. 1998, Pp.: 178-192.

¹⁹ 直到現在澳大利亞每年的移入人口都是以英國或是紐西蘭分居第一位和第二位，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亞洲地區移民人數排名擠到前五名，然而來自其他地區的白種移民始終沒有間斷。詳見 Commonwealth Bureau of Census & Statistics publication, Australian Demography (Sydney:

的白種人移民早期以來自西歐為主，如德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等都有不少移民，戰後是南歐移民為主，以義大利、希臘等為大宗，自八十年代以來，來自前蘇聯國家及東歐各國的移民快速增加²⁰，最近則以南非和前南斯拉夫的移民為多。澳洲的非白種人移民以亞裔居多，就人口總數而言亞裔移民並不顯著²¹，亞裔移民之所以受到注目，並非基於移民太多，而是亞裔移民在外貌上和主流社會的白種人相較，顯得比較顯著，亞裔移民增加在大都會的街頭上即可感受到，但實際上亞裔移民的人口增加比例並不顯著。

亞裔移民之所以比較顯著，基於以下幾個事實：第一，除了亞裔移民以外，其他非白種人移民的人數很少，如來自非洲、中東以及中南美洲的移民人數很少，因此亞洲移民突顯出來，非白種人移民和亞洲移民經常被劃上等號。第二，絕大多數的亞洲移民是在七十年代後期，澳大利亞宣布正式廢止白澳政策之後才移民澳洲，亞裔移民的增加是對於過去單純以白種人為主的主流社會而言是很容易感受得。第三，亞裔移民喜歡住在大都會，也很容易有聚居的現象，商家用不同文字的招牌，來自亞洲各國的餐廳開張，提供和西式餐點極為不同的食物，甚至各大埠都有中國城以及亞洲食品店，都是顯而易見的。第四，部分亞裔移民具有商業背景，或是專業人士資格，易於進入傳統上第一代移民不易跨足的領域，如醫師、會計師、建築師或是金融投資等圈子，能見度較高。

在亞裔移民之中，華裔移民是人數最多，但是組成也最為複雜，但是在各種官方統計中則未必會顯現出來²²，然而華裔移民眾多主要是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地區的華裔移民前來澳大利亞居住。以時間順序及其來源地而言，有在十九世紀淘金熱時代來澳華工的後裔，以說台山話的四邑人士為主，其後裔和不同族裔有許多通婚的情

Commonwealth Bureau of Census & Statistics publication), 1993.

²⁰ 關於這些非來自西歐的白種移民增加的趨勢，詳見 E. F. Kunz, Pisplaced Persons: Calwell's New Australians. Sydne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8.

²¹ 關於在澳大利亞的亞洲移民的相關統計，詳見 Christine Inglis ed. Asians in Australia: the Dynamics of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

²² 我們以 1993 年到 1997 年移民到澳大利亞的人口出生地統計為例，依大小順序分別為 New Zealand: 53.6 千人(13.0%), United Kingdom and Ireland: 53.2 千人(12.9%), China: 28.9 千人(7.0%), Viet Nam: 21.0 千人(5.1%), Hong Kong: 19.5 千人(4.8%), Philippines: 17.2 千人(4.2%)。從這個數據中，並不會感到華裔人口有較多的趨勢，詳見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9 Year Book Australia. Canberr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1999.

況，某些特定地區的華人則傾向和澳洲原住民通婚，但在名義上因為父系的姓仍然保留下來，或是家族史易於追索，不少有華人血統者樂於自認或被認為華裔，例如 1990 年當選第一位華裔聯邦參議員的劉威廉(William George O'Chee)²³，以及 1999 年當選墨爾本副市長的李錦球(Hon Wellington Lee)²⁴，都是來自這個背景，算是第四代或是第五代華裔移民。

白澳政策之前即留在澳大利亞的華裔移民人數終究有限²⁵，根據統計，人數最少時僅餘數千人，也受到澳洲社會的排斥²⁶，或者是在當時澳洲社會不易見容異質文化下被同化，可以說直到白澳政策廢止之前，對後來的移民是採取同化政策²⁷。在白澳政策期間(1901-1973)，對華人入境比較嚴格，僅有少數的華裔人士得以入境²⁸，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政策已經比較寬鬆，部分華人因為就學及工作關係而取得居留權，1999 年當選新南威爾斯州參議員的黃肇強醫生(Dr. Peter Wong)²⁹，以及同時當選的前雪梨市副市長曾筱龍

²³ 劉威廉，1965 年生於昆士蘭州，祖籍中國廣東省中山縣，在昆士蘭政府學校受教育，後前往英國就讀，牛津大學法律系學士，1990 年五月獲得昆士蘭州國家黨提名，成為澳大利亞第一位聯邦參議員。其實祇有四分之一的華人血統，但是根據華人傳統的父系原則仍是華裔，在華文報刊上員經常有他的消息，他本人也樂於和華裔社群往來互動，並以其華人血統為傲。

²⁴ 李錦球，1925 年生於達爾文，祖籍中國廣東省臺山縣，原是藥劑師，熱心社區服務工作，主要活動地區是在墨爾本市或是維多利亞州，活躍於退伍軍人協會、紅十字會、獅子會及華人社團聯合會等社團，自 1977 年起先後擔任多次墨爾本市政局議員，是最早投身市政議員的華裔，1999 年由市政局議員勝任墨爾本副市長。

²⁵ 參考 Wang, Sing-wu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Emigration, 1848-1888: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Emigration to Australia.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8.

²⁶ 關於白澳政策期間以華人為主的亞洲人在澳洲的情況，詳見 Barry York, Admissions and exclusions: Asiatics and other coloured races in Australia: 1901 to 1946. Canberra: Centre for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Studies, 1995.

²⁷ 關於早期澳大利亞對移民的同化政策，參考 Christine Brenda Inglis, The Darwin Chinese: a study of assimilation.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67. 以及 Ronald Taft, From stranger to citizen: a survey of studies of immigrant assimilation in Western Australia, London: Tavistock, 1966.

²⁸ 關於華裔移民所受到入境時比較嚴苛的規定，詳見 Barry York,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1901-1957: annual returns as required under the Australian Immigration Act between 1901 and 1957 on persons refused admission, persons who passed the dictation test and departures of coloured persons from Australia. Canberra: Centre for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Studies, 1992

²⁹ 黃肇強醫生，生於中國廣州肇慶，祖籍廣東省紫金縣，原居印度尼西亞，在六十年代來澳大利亞，取得醫學學位成為執業醫生，主要居住地區在雪梨，熱心中文學校及華人社區事務，1991 年成立澳洲華人公益基金，擔任主席的黃肇強醫生帶動華社支持籌款，基金做為照顧傷殘老弱及遭受意外者，1998 年為反制一族黨發起成立團結黨(United Party)，擔任主席，於 1999 年新南威爾斯州當選參議員。

(Henry Tsang)³⁰，都是在這個時期移居澳洲，算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代華裔移民。今日澳洲華人移民，主要還是在白澳政策正式廢止以後才有大批各地華人入境，構成今日澳洲華人的風貌³¹。

首先最大一批華裔移民是來自中南半島的移民，主要是以難民身分來到澳大利亞，尤其是西貢淪陷以後，大批越南華人夾雜在越南船民向外奔逃，澳大利亞則因人道因素收容其中一部分，同樣情況的移民有來自柬埔寨、寮國和東帝汶。對澳大利亞而言，這是自白澳政策正式廢止以後人數最多的一批亞裔移民，以致於留給澳洲主流社會的印象最深刻，多年以後這個印象仍然留存，經常在論及亞裔移民時會提到這種難民印象。八十年代初期，專業人士型的華裔移民漸漸增多，主要以來自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或其他地區接受大英聯邦教育的華裔人士，很多是具有醫師、律師、會計師等專業資格，具有這種資格的人士一方面易於移民到澳大利亞，另一方面稍早時星馬地區的族群政治也是造成許多人才滯外不歸的因素，這批人構成澳洲社會新的中產階級³²。澳大利亞華裔移民如果和其他移民國家相比，最大的特色在於，稍早時的華裔移民以來自東南亞的華裔最多³³，是移民研究中的「二次移民」的極佳例證。

到了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這段期間，明顯地來自中港台的移民構成了華裔新移民的主要成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移民，主要

³⁰ 曾筱龍，1943年生於中國江西省南昌縣，祖籍廣東省五華縣，1949年隨家庭遷徙香港，在香港受小學到中學的教育，在六十年代來澳升學，1969年獲得新南威爾斯大學建築系學士學位。主要居住地區是雪梨，從事建築師工作，熱心參與華人社團工作，對美化雪梨唐人街市容頗有貢獻，1991年由澳洲工黨提名，當選雪梨市市議員，同年出任雪梨市副市長，連任兩屆雪梨市副市長，是華人最早出任澳洲主要都市行政長官者，1998年新南威爾斯州大選，由澳洲工黨提名當選州參議員。

³¹ 關於這個移民政策的轉變過程以及影響，參考 Barry York, From Assimilationism to Multiculturalism: Australian Experience 1945-1989. Canberra: Centre for Immigration & Multi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ustralia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1996.

³² 關於澳洲華人或亞裔的經濟生活，出身馬來西亞的紀寶坤(Kee Poo Kong)有一連串的研究著作，例如 Kee Poo Ko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Construction of a Socio-economic Profile. Canberra: Office of Multicultural Affairs, Dep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1988. Kee Poo Kong Home Ownership and Housing Conditions of Immigrants and Australian-born. Canberra: Australian Govt. Pub. Service, 1992. Kee Poo Kong Social and Economic Attainments of Immigrant and Later-generation Australians. Canberra: Australian Govt. Pub. Service, 1992.

³³ 參考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Australia. NSW: Allen and Unwin, 1992.

是由留學、讀英語以及打工的中國公民，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力爭而取得澳洲居留權，構成人數最多的一批新移民，約有四萬人，加上這幾年親屬團聚，人數可能在十萬之譜³⁴。來自香港的移民則是受到 1984 年中英聯合談判到香港 1997 政權轉移的事件影響，一段時間每年有持續穩定的移民來到澳大利亞，移民則和階層都有，從富豪到勞工階層都有。來自台灣的移民在人數上雖然較少，但是因為符合移民資格以商業投資移民為主，新移民的經濟比較寬裕，活動力也很強³⁵。

因此澳洲華裔社群的組成和政府的統計數據有相當的差距，澳洲的統計數據以出生地為分類標準，其中亞裔人口來自亞洲各國都有，從政府出版品的統計資料我們看不出這個華裔社群存在，然而實際上，由星馬來的移民以華裔佔絕大部分，馬來人很少，同樣的情況印度尼西亞的移民也是以華裔為主。至於從「印支三邦」(Indochina, 即越寮棉三地)來的移民，其中也有不少華裔，在澳大利亞多稱為印支華人，惟實際人數無法得知，從日常生活的觀察可看出許多成員很容易同時參與華裔社區及印支移民社區的活動，和這兩個社區的成員通婚的比例都很高，華裔的限界有時不是太清楚，同樣的情況也在來自菲律賓和東帝汶的移民社群中出現，這顯示澳洲華裔和澳洲亞裔的密切關係，因此有時候在指涉澳洲華裔時常常要以澳洲亞裔來代替³⁶，顯示了澳洲華裔的多元風貌³⁷。一般華文報刊對於澳洲華裔人口的估計是四十萬人，對照澳洲華裔移民的歷史與政府統計資料，這個數字應稱合理。

那麼在這個多元風貌的澳洲華裔，我們是否可以用「華裔社區」或

³⁴ 關於從中國大陸來澳大利亞的新移民，詳見 Edmund S. K. Fung and Chen Jie "Changing Perceptions: The Attitudes of the PRC Chinese Towards Australia and China, 1989-1996" Brisbane: Griffith University, Faculty of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ntre for the the Study of Australia- Asia relations. 1996.

³⁵ 關於這一批新華裔移民狀況，詳見 Diana Giese Astronauts, Lost Souls & Dragons: Voices of Today's Chinese Australians in Conversations with Diana Giese. St Lucia, Qld. :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96.

³⁶ 例如在《澳大利亞亞裔名人錄》(Who's Who in the Asian Community of Australia. Melbourne: Multi Publications. 1992)多半是出身不同地區的華裔人士，在公共事務上，華裔佔亞裔的比例很高，因此有時候交替使用這兩個不同範圍的名詞。

³⁷ 實際上澳洲亞裔社群的組成很複雜，詳見 James E. Coughlan ed., The Diverse Asians : A Profile of Six Asian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Nathan, Qld: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Asia Relations, Griffith University, 1992.

是「華人社群」等名詞來描述，而視為是一個寬鬆的共同體呢？相關的研究顯示，早期留在澳大利亞的華人很早就有澳洲華人認同的觀念³⁸，在較小範圍的社區研究也顯示不同背景的華人有各種不同層面的互動關係³⁹。然而在九十年代以前，由於缺乏較大範圍的互動空間，有時還是難以想像這些不同背景的華人華裔有共同的利益與旨趣，例如七十年代有華人極力撇清華裔移民和華裔難民之間有任何關係，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有華裔議員極力反對放寬給予中國大陸留學生永久居留權的主張，顯示當時不同群體彼此利益考量不同。然而體察九十年代的發展，大致可以說出身不同背景的華人代表都能體會華人社群的利益是個整體，似乎可以說一個想像的共同社群已經在不同的華文書寫中成形，華文報刊出現澳洲華人社會或是澳洲華人利益福祉等的論述都是以全體華人為對象，儘管華人來自不同地區的影響還是處處可見，但是共同形塑一個新的澳洲華人圖象的意旨仍是十分清晰。

筆者以為，這個澳洲華人圖象的形塑和澳洲中文報刊的發達有直接正面的關係。根據統計，到 1997 年年底止，澳大利亞共有各種中文報刊 42 種。⁴⁰ 九十年代以前澳大利亞祇有中文報紙僅有 2 家日報和 2 家周報聊備一格，九十年代之後，澳洲中文報刊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目前主要中文報紙有：《澳洲新報》、《星島日報》、《澳洲日報》和《自立快報》，最近尚有一份《東華日報》開辦，這些報紙均為日報⁴¹，每天各報出版 28 版至 36 版，週末增至 52 版至 64 版，每週還隨報附送一本印刷精美的集文藝、娛樂及專題報道的週刊雜誌，比起中港台星馬的中文報刊不多遑讓。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之後，現在各報都是以澳洲新聞及澳洲華人相關新聞放在頭版、二版、三版，

³⁸ 參考 Yuan Fang Shen, Dragon Seed in the Antipodes: Chinese Australian Self-Representations. Canberra: ANU PhD thesis. 1998.

³⁹ 例如 Mo, Yimei, Self-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in Tasmania. Canberra: ANU thesis, 1994. 以及 David Ip and Constance Lever-Tracy, Trailblazing Into China: Networks and Linkages of Smaller Diaspora Firms. Murdoch, W.A.: Asia Research Centre, 1994.

⁴⁰ 詳見經緯 澳洲中文報刊一瞥 《開放與傳播》1998，第二期。文中提到「澳大利亞 40 余萬華人，平均每一萬人就擁有一種中文報刊，連主流社會英文報業的老總們都驚訝中文報業為何如此迅速發展。」

⁴¹ 除了這些全國性的日報以外，各華人聚居的城市如雪梨、墨爾本、布里斯本，都辦有各種各樣的周報、期刊。比較有影響的有《華聯時報》、《東方郵報》、《華僑時報》、《華人商報》、《多元文化報》、《華文鏡報》、《大洋時報》、《雪梨周報》和期刊《大世界》、《滿江紅》、《漢聲》、《熱點》、《文化薈萃》等雜誌，連南澳大利亞阿德雷市華人移民僅 2 萬多人也出了一份《南澳時報》。而華裔移民祇有四千人的首都坎培拉也有《首都華人報》及《南極星》兩份刊物。

從新聞的取舍選擇到論述的角度，都顯然指向一個方向大抵相同的澳洲華人旨趣，各報其他的版面都有中港台新聞，以及東南亞或各地華人新聞，加上國際新聞，讓各地來的華裔移民各取所需。這些都顯示所有的中文報紙，不論其創辦人來自何方，都是以所有澳洲華人群體為對象⁴²。

由於澳洲華人的移民歷史比較淺短，除去比例極小的十九世紀華人移民之後，許多華裔移民家庭仍是以第一代移民當家主事，這些第一代的移民之中很多仍是可以閱讀中文報刊，因此尚可以在這些中文報刊為園地，共同形塑了華裔社區的空間。在日常生活上也許華人參加各種不同社團，和自己鄉親互動為主，未必會和不同背景的人互相聞問，但是澳洲有關華裔族群的問題，則中文報刊儼然成為華裔社群的喉舌。中文報刊的蓬勃是在澳大利亞政府沒有主張同化或溶解少數民族文化的大前提下，讓多元文化各放異彩而有的發展空間。華人移民可通過中文報刊多方面認識澳大利亞，對新移民融入主流社會有積極作用，而澳洲主流社會也會透過中文報刊來透露訊息給華裔社群，例如每逢華人節日如端午節、中秋節、春節，澳大利亞政府首腦、執政黨自由黨、國家黨和反對黨工黨等政黨領袖，都會不約而同地在中文報紙上題字亮相或發表談話，向華人社區致以祝賀。在這種情況下，多元風貌的澳洲華裔，除了保有各自來源地的認同以及，還有一個寬鬆的澳洲華人認同，同時當然如果取得了澳洲公民的資格，在法律上就是澳大利亞人，不因族群認同的不同而改變。

「一族黨」的興起對多元文化主義的衝擊與華人社群的回應

「一族黨」的興起對自從廢除「白澳政策」之後就提倡文化多元主義的澳大利亞而言到底有何意義，各界的解釋出現有南轅北轍的傾向，對於責任歸屬也有兩極化的不同討論。有人認為「一族黨」的興起是一個意外，是1996年澳洲聯邦大選時兩大黨忽略了昆士蘭州一個名為歐斯利(Oxley)的選區，因為這個選區被認為是澳洲工黨最安全最有把握當選的地區，自由黨就找了不論在教育及政治經歷都毫不起眼的一名炸魚速食店女店長寶琳·韓森出馬，等到發現她的言論有種族主義傾向時也祇是簡單地將她開除黨籍，並不認為她有

⁴² 這些日報的發行都是以全國各大埠為對象，在雪梨出版的日報，一般當天早晨7時前就送到各出售點，車站、超市、書店、雜貨店，甚至連出售六合彩票的投注站，不論澳人開的，還是華人開的，都有中文報刊出售。發行外地也通過航空公司運送，當天中午就可在墨爾本、布里斯本等大城市報攤上買到。

任何當選的可能，沒有到她強烈抨擊澳洲原住民獨享特權的言論吸引了全國媒體的注意⁴³，從而打響了其知名度，反而令其意外當選，才讓這種言論得到了舞台。這種解釋認為是兩黨政治技術失誤加上媒體炒作才使澳洲出現「一族黨」。

也有人認為「一族黨」的興起在澳大利亞有其源頭和社會基礎，除了歷史上揮之不去的白種人優越感傳統作祟，以及過去長期白澳政策以來所養成的封閉排外心態之外⁴⁴，還有近年來因為經濟困頓以及失業率高居不下的挫折感，讓「一族黨」似是而非的言論有其市場。

「一族黨」經常利用的把戲，即利用愛國主義式的論述散佈危言聳聽的論調，如「一個國家、一種人民、一種語言」，來抨擊文化多元主義所造成文化異質現象，用來排斥亞裔移民。或是利用簡單歸因的手法，將經濟問題、失業問題或是傳統流失的問題，全都怪罪到亞洲移民及澳洲原住民身上，這樣的言論也是在澳洲社會有部分的支持群眾⁴⁵。

從後來的發展來看，似乎後者比較合乎情況。寶琳 韓森的言論成為災難，主要是在 1996 年 9 月，以新當選的獨立女眾議員的身分在國會發表演說，反對文化多元主義，表示澳洲正在有被亞裔人士「淹沒」的危機⁴⁶。當寶琳 韓森發表這篇煽動性演辭時，是很多人在當地的電視及電台清談節目中表示支持⁴⁷，澳洲政府坐視不理，澳洲總理霍華德(John Howard)當時拒絕指摘寶琳 韓森，只表示她有言論自由，而知識界則有事不關己，沒有發出聲音來澄清其中謬誤，造

⁴³ 參考 Anne Pattel-Gray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s in Australia” Indigenous Communications, Issue 3/97. 1997.

⁴⁴ 關於這種因為白澳政策影響下的排外心態，一直存在澳大利亞社會，類似的辯論持續不斷，例如 Geoffrey Blainey, All for Australia, Sydney: Methuen Haynes, 1984. Andrew Markus and M. C. Ricklefs, Surrender Australia? Essays in the Study and Uses of History: Geoffrey Blainey and Asian Immigration, 1985.

⁴⁵ 連澳洲外交部長唐納(Alexander Downer)都曾經向外國媒體承認，其實澳洲人民之中確有某種比例的群眾是寶琳韓森的支持者，見 1998 年 8 月 30 日 Sydney Morning Herald, Hamish McDonald 的相關報導。

⁴⁶ Pauline Hanson, “Australia, Wake Up!” Pauline Hanson maiden speech to Australian Federal Parliament, Tuesday 10th September 1996, 5.15 p.m. In Hanson, Pauline (Pauline Lee) Pauline Hanson-- the Truth : on Asian Immigration, the Aboriginal Question, the Gun Debate and the Future of Australia. Ipswich, Qld.: P. Hanson, 1997.

⁴⁷ 詳見 Helen Dodd, Pauline, the Hanson Phenomenon. Sydney: GWB, 1998.

成言論不平衡的現象⁴⁸。這顯示澳洲對於種族歧視等問題掉以輕心，雖然是祇在言論層次，由於政府沒有及早回應和處理，招致嚴重的惡果⁴⁹。不幸的是，隨後寶琳·韓森所挑起的火頭如雪球般越滾越大，引起亞洲地區人士的廣泛關注⁵⁰，這顯示澳洲政府低估了種族歧視議題在亞洲社會可能引起關注⁵¹。很多澳洲人致力為國家營造一個友善的多種族及多元文化形象而長期苦心經營，卻被寶琳·韓森廉價的種族主義爭論而破壞於一旦⁵²。

寶琳·韓森在1997年4月成立「一族黨」，開頭宣稱有五千個黨員⁵³，根據當時的摩根民意測驗顯示，約有13.5%的澳洲公民表示會把票投給該黨⁵⁴。澳洲的種族議題固然是因為「一族黨」的興起而引發，然而該黨的興起卻是在聯盟黨執政之後才發生，聯盟黨雖然沒有支持反亞裔移民的言論，但是首相霍華德卻不肯問口譴責相關言論，僅以言論自由縱容其發展，因此「一族黨」的興起，聯盟黨難辭其咎⁵⁵。相較之下，在1996年選輸的工黨顯得立場堅定，在此之前執政十三年的工黨政府不但大力宣傳多元文化政策，而且強化和亞洲國家的聯繫，以視澳洲為亞太地區國家為榮。兩大黨雖然在移民政

⁴⁸ 知識界沒有適時發揮應有的道德勇氣來阻止「一族黨」的言論，也引起批評與討論，參考Barrie Jones “Public Intellectuals: How Academe Has All But Lost Its Voice” *Sydney Morning Herald* Wednesday, June 2, 1999.

⁴⁹ 許多媒體報導都認為政府的反應不明快是導致寶琳·韓森的言論得以造成傷害的原因，參考“Australia Leaves Asians Aghast” *Los Angeles Times*, 26 August, 1999.

⁵⁰ 參考S. Karene Witcher, “Australia weathers race debate--for now,”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31, 1997.

⁵¹ 原任香港立法局議員的劉慧卿(Emily Lau)，應邀擔任澳洲電視第九台「六十分鐘」時事節目客席記者，分別在香港、曼谷等亞洲各地及澳洲進行訪問，探討寶琳·韓森事件對澳洲形象及經濟利益在亞洲所帶來的影響。被訪者一致指摘寶琳·韓森令澳大利亞形象受損，並要求澳洲政府盡最大努力去控制這危機，避免問題惡化；他們亦促請澳洲政府加強教育澳洲人民有關多元文化的好處。詳見劉慧卿「種族歧視在澳洲」（一九九七年七月廿九日）。

⁵² 相關意見很多，例如學者警告韓莘負面影響巨大，破壞澳洲友善多元文化形象《自立快報》1997年12月5日。連澳洲外交白皮書，都必須要專章討論寶琳·韓森所造成的澳洲形象受損的問題，詳見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ustralian Diplomatic Digest: News and events defining Australian diplomatic practice*, 1997. Canberra: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⁵³ 參考“Australia: Hanson Launches Party” *Migration News*, Vol. 4, No. 5 May, 1997.

⁵⁴ 詳見Murray Goot “Hanson’s Heartland: Who’s for One Nation and Why” In Robert Manne ed. *Two Nation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Rise of the One Nation Party in Australia*. Melbourne: Bookman Press. Pp. 53.

⁵⁵ Margaret Allum, “Hanson can’t be ignored” *Green Left Weekly*, no. 332, September 9, 1998. Pp. 1-3.

策的實務上，看法大同小異，但是對於多元文化政策及亞洲親善政策的承諾上卻大有不同。

真正讓「一族黨」坐大的是澳大利亞兩大黨的惡質競爭，「一族黨」成軍的第一次操兵是 1998 年 6 月昆士蘭州的大選，當時聯盟黨的主要政黨自由黨自忖可能會輸給工黨，因此想要拉攏其他的小黨，因此把優先票撥給「一族黨」，其算盤是寧可讓「一族黨」多幾個席次，也不願工黨上台，以換取「一族黨」的優先票。聯邦總理也是自由黨黨魁何華德沒有制止這種做法，祇說是由各州的自由黨人自行決定，言下之意，和「一族黨」換票祇是選舉策略，非關道德。選舉結果是「一族黨」在選舉中異軍突起，得到成為關鍵少數的席次，掌握了總選票的 23%，在州議會一舉奪得了 11 席，成為該州第三大政治勢力，而自由黨卻在昆士蘭州因此而淪為少數在野黨，改變了昆士蘭兩黨政治的生態，使得「一族黨」意氣昂揚⁵⁶。

這種發展情況對華裔社群來說自然是引起很大的反應，「一族黨」散播反亞裔的情緒，澳洲華人是首當其衝，而「一族黨」起家的昆士蘭州首府布里斯本又是華裔移民聚集的地方，引起的反應很大。這次選舉中有台灣移民的第二代黃文毅參選，但是由於是自由黨提名，而昆士蘭州自由黨與「一族黨」的曖昧結盟態度令華裔選民感到不恥，黃文毅必須一再在華文報紙刊登廣告解釋其立場，但是他所提出的留在主流政黨反擊種族主義的立場受到不少冷嘲熱諷，最後競選失利，相信也與此有關。這種態勢的發展後來還使得新南威爾斯州的自由黨參議員何沈慧霞(Helen Sham-Ho)宣布暫時退出自由黨⁵⁷，以示和自由黨的政策劃清界限。

華人社群在報刊上激烈地討論著應該如何行動因應這一局面，在過去許多華人把選票投給自由黨，這也許是因為不少華人移民有商業背景，對於自由黨傾向自由經濟的意識型態比較能認同，反過來說，多數華人移民都是靠自己勤勞打天下，未必能欣賞澳洲工黨強調以社會福利來實現社會正義的政策，對於澳洲工黨的社會基礎----工

⁵⁶ 詳見楊聰榮 澳洲大選結果，影響種族氣氛 《美東自由時報》 民主論壇 1998 年 10 月 2 日。

⁵⁷ 何沈慧霞是香港移民，原為執業律師，1988 年為自由黨提名成為新南威爾斯州參議員，在華人移民眾多的雪梨地區成為長期唯一的華人議員，1998 年受到華人社區排斥自由黨和對待「一族黨」政策的壓力，退出自由黨，目前為獨立人士，詳見 迷失的何沈慧霞 《自立快報》1999 年 3 月 29 日。

團運動與工會組織，也顯得較為陌生。不過，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華裔移民對澳洲工黨的好感慢慢浮現，至少其對待「一族黨」的態度始終清楚明白，強調要阻止種族主義言論漫延，因此在兩大黨政治的澳大利亞，華人必須二選一的情況下，工黨得到多數的支持，從華文報紙的討論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轉變與趨向。

1998年10月3日澳大利亞舉行聯邦國會大選，這是「一族黨」成立後第一次聯邦大選，選前不到四個月又有「一族黨」在昆士蘭州大選中大勝，這次大選便自然成了人們觀察種族主義勢力的指標⁵⁸。澳大利亞此次共有1,435位候選人角逐國會參眾兩院議席，其中1,106人競選眾議院148個席次，329人競選參議院改選的40個議席。這次選舉對華裔社群來說最大的意義是為了打擊「一族黨」的勢力，引發了華裔社群的參政熱潮，並且在選舉前夕以華裔社群為主導成立了跨族裔的新政黨，名為「團結黨」，由黃肇強醫生擔任主席。

對主流政黨而言，澳洲總理霍華德決定提前舉行大選，主要是為推動稅改方案，並避免選舉結果受經濟惡化影響，澳洲兩個大黨，聯盟黨及工黨在競選時都把議題放在稅制改革及失業問題上⁵⁹，刻意避免關於移民、種族及多元文化政策的辯論⁶⁰，然而，對亞裔社區而言，經濟問題之外，日後種族和諧關係是否能夠維持，才是關鍵。小黨如民主黨和團結黨，都把選舉的箭頭祇向「一族黨」，認為他們可以發揮制衡「一族黨」的功能，形成了大黨談稅制，小黨談移民及種族問題的場面⁶¹。雖然種族問題不是競選的主題，但選舉結果無疑會影響到澳洲未來的種族議題的走向，值得做比較細緻的分析。就聯邦政府的層次而言，霍華德所領導的執政黨「自由黨 - 國家黨執政

⁵⁸ 時代周刊(Time)在選前以澳大利亞為雜誌封面專題報導，便是把寶琳韓森所引起的種族主義言論與排外情緒，列為今日澳洲所面臨最重要的挑戰，詳見“Australia Today: Amid the Challenges of Change, a Spirited Young Nation Advances into the World” Time, September 28, 1998. pp. 38-67.

⁵⁹ 對兩大黨而言，任何一黨選勝，立刻就面臨了如何因應亞洲經濟危機的問題，所以稅制改革、提振經濟以及改善失業等經濟性的議題，當然是成敗的關鍵。三年前工黨黯然下台，也是因為失業率太高所致，所以兩大黨都卯足了勁繞著經濟民生問題轉，基本上這是這次選舉的主軸。

⁶⁰ 民意測驗顯示移民相關政策議題的重要性在這次聯邦選舉中排名第十四，有些外國媒體對於澳洲以經濟問題為主軸的選舉興趣缺缺，或者以形容為「平淡無奇」，或是繞著「一族黨」的黨魁韓森的花邊新聞轉。

⁶¹ 小黨一般而言，既不可能執政，祇能從制衡角度來談，很難在稅制問題上發揮，移民問題涉及道德問題，就成為小黨集中焦點的地方。至於大黨為什麼不願意多談移民問題及種族問題，原因是談了不見得能夠吸引到選票，說錯話反而很容易失分。

聯盟」贏得大選，霍華德連任總理⁶²，華人方面，國家黨提名的劉威廉未能連任，但是自由黨提名的陳之彬當選聯邦參議員，在執政黨聯邦議會保持一名華裔參議員，似乎是一切照舊沒有改變，但是政黨的勢力消長卻有不同結果，由畢茲利(Kim Beazley)領導的澳洲勞工黨未能贏過執政聯盟，但已大幅削弱執政聯盟的優勢地位⁶³。

就「一族黨」而言，大選結果是該黨在參議院祇得一席⁶⁴，而眾議院全軍皆墨，黨魁寶琳·韓森在其選區布萊爾失利，各界的反應是「一族黨」慘敗，難以在澳洲政壇上興風作浪。不過如果細看該黨的得票率，卻是比一般預期要高，得到全國 8% 的選票，是兩大黨之外得票最高的政黨⁶⁵，一個上次大選還不存在的政黨，成為第三大票倉，其中的涵意耐人尋味，值得深究。「一族黨」的候選人在聯邦選舉的失利，主要和澳洲的選舉制度有關⁶⁶，在聯邦選舉中，像「一族黨」這樣的小黨沒有當選席次，是可以預期的。表面上看「一族黨」在聯邦選舉是慘敗，但是其選票卻顯示「一族黨」在澳洲仍有相當勢力，後來 1999 年 3 月的新南威爾斯州大選顯示出該黨可得到穩定的 8% 選票。澳大利亞未來的政治發展是否真能擺脫白澳政策及種族政治的陰影，現在還難以下個定論⁶⁷。就韓森在其選區的表現而言，她的選票以接近百分之四十的第一優先票，遙遙領先其他候選人，再其之後的工黨及自由黨的候選人都祇各得百分之二十多的選票。韓森之所以落敗的原因，是各黨聯合封殺韓森，在選前該選區

⁶² 有關這次大選的詳細結果，參考 BBC News Online: Special Report: At a glance: Australian election '98. October 4, 1998.

⁶³ 澳洲勞工黨雖輸了大選，其實並不算輸。因為從兩黨的得票率來看，勞工黨已超過半數，勝過執政聯盟，霍華德雖連任總理，贏了眾院的席次，卻輸了得票率。畢茲利在 1996 年自前總理基亭手中接到的是一個積弱渙散的政黨，在眾院的席次只有 49 席，現在又把勞工黨的氣勢又拉抬起來，可以說是自二次大戰以來澳洲反對黨最大的勝利。

⁶⁴ 這一席由希爾(Heather Hill)當選，但卻傳出希爾本人仍持英國護照，華人方嘉旭及蕭乃良入稟法院，要求取消其當選資格，目前官司還在審理中，這一席是否會有問題，仍在未定之天。詳見相關報導，例如 高院法律行挑戰希爾席位，華人社區籌款聲援方嘉旭 《自立快報》1999 年 2 月 13 日。以及 Bernard Lane, "UK not Foreign, Says One Nation" The Australian, 30 March 1999.

⁶⁵ 一族黨在全國總得票得到百分之八，比起以往長期居於第三大黨的民主黨，卻祇得到百分之五要高出許多。

⁶⁶ 澳洲的聯邦選舉制度是小選區單議席制，這種情況是不利小黨競選，如果再和聯盟黨中的國家黨相比，國家黨也祇得到百分之五的選票，卻得到十二席眾議院席位，一族黨得票總數雖然略高，但是因為得票分散，卻一個席次也沒有得到。

⁶⁷ 詳見蘇東牧 韓森中箭下馬，一族黨陰魂未散 《中央日報》中央公論 1998 年 10 月 7 日。

其他候選人互相約定，在選票的優先順位上，全部把韓森放在最後⁶⁸。韓森做為「一族黨」的創始人及黨魁，雖以其言論大膽著稱，然而她的言論會得到廣泛報導，也是由於她國會議員的身分，現在一旦競選失敗，失去了舞台，聲勢自然大受影響⁶⁹。

回過頭來看華裔社群的參政熱潮及主導成立的團結黨，要評估其成效必須要從前因後果來看。對於華裔社區乃至於亞裔社區來說，工黨在反種族主義言論的立場堅定，如果要制止反亞裔言論的進一步的發展，在澳洲兩大黨政治體制下，自然是應該支持工黨。而華裔社區甚至更進一步，聯合其他族裔社區成立「團結黨」，在各移民社區都推出了候選人，然後將優先票撥給工黨。這種先把票投給團結黨，再將優先票投給工黨的策略，固然是由於澳大利亞採行多重選擇優先順位選票制，可以保障小黨的生存，不致因為選民擔心浪費票源而不投給小黨，所以少數族裔也可以利用成立政黨來表達意見⁷⁰，無疑地亞裔社區已經普遍感覺到，亞裔必須發出聲音，才能平衡澳洲主流的言論⁷¹，然而採取成立政黨的做法也冒了相當大的風險，因為是在明白不太可能當選的情況下推出候選人，選舉結果零落是可以預期，甚至會因此影響士氣。然而既使是在這種情況下，團結黨仍然在各地推出了七十多個候選人，其中十五位是華裔人士，參選熱潮前所未有。結果是全軍皆墨，原來預定以得票率希望分得一席參議員的希望也落空。除了團結黨以外，另一個以華裔人士為主的民意黨(The People Party)也是一無所獲⁷²。

我們不應該以選舉的結果來看待華人參政熱潮，至少各華文報刊都給予正面的肯定，認為參選本身已經清楚地將各不同族裔社區的意旨清楚地表達⁷³。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華人社群的強烈反響的確達

⁶⁸ 澳洲的選票制度是採取優先順位制度，投票像選填志願一樣，要排先後順序。如果其他的選票都把韓森排在最後，意味著除非她能在第一順位優先票中取得超過百分之五十，否則票數再高都無法當選。後來韓森就在得不到其他優先順位選票下落選，故她的失敗是各黨利用選舉制度封殺所致。

⁶⁹ 詳見 攻擊亞洲移民，自詡澳人國母，漢森淒然落選，這個種族主義政黨仍有生存的土壤《環球時報》，1998年10月15日相關報導。

⁷⁰ 參考曉剛 切莫放棄一票兩投的權利 《自立快報》1999年3月27日。

⁷¹ 各族裔社團曾多次組織反對「一族黨」種族主義言論的遊行，參考相關報導，例如“Anti-Hanson rallies expected to attract large crowds” The Australian, 8 June 1998.

⁷² 民意黨的主席是鄔延祥，是雪梨市市議員。

⁷³ 據統計，這次聯邦大選，所有參加參議員及眾議員的華裔人士，一共有26位，各華文傳媒

到一定的效果，因為主流政黨在和少數族裔社區打交道時都收到清楚的訊息，然後逐步調整步伐，最後終於因為各黨有共識，認清韓森的言論造成的傷害，而將聯合夾殺韓森，導致韓森在選區失利，挫斷了「一族黨」銳氣。回顧「一族黨」在澳洲發展的歷史，卻是由於主流政黨姑息所致，如果早在「一族黨」剛剛崛起之際，就有共識來封殺這種具有強烈排外情緒的政黨，也不致於惹出這許多是非。

「一族黨」被封殺以後，其內部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先後傳出「一族黨」的黨員對奧德菲爾德(David Oldfield)、韓森等所組成的領導班子深感不滿，要求重組領導階層，也有高層黨工對於內部財務狀況提出質疑，最後在昆士蘭州議會的「一族黨」在短短一年內，失掉逾半數席位，辭職及被開革的都有。從現在的發展趨勢來看，可以說「一族黨」的氣焰已經暫時成功地被壓制住，難以在澳洲政壇起什麼大波瀾，但是有一定的支持者。1999年的新南威爾斯州大選證明了這一點，「一族黨」有固定的票源，在參議員方面得到一席，由奧德菲爾德出任⁷⁴。

在「一族黨」刺激下興起的華人參政熱潮，雖然在1998年聯邦大選因倉促成軍，成果不理想，但是華人參政的熱潮卻持續了下來，1999年3月新南威爾斯州大選，卻開展了新的局面。這次大選同樣出現的十幾位華裔人士出馬競選⁷⁵，其中團結黨得到華裔社區的熱烈支持⁷⁶，雖然經過內鬨事件⁷⁷，後來將傷害減低，最後成果也是令人振奮，

都將華人參政熱潮當成焦點新聞，參考黃玉液 投票選蘇震西是明智之舉 《自立快報》1999年2月15日。

⁷⁴ 奧德菲爾德是「一族黨」的高級顧問，具有從政經驗。他在一九九七年加入「一族黨」之前，曾在郝爾德總理任職期間，擔任一名聯邦內閣部長的助理多年。

⁷⁵ 其中有多位華裔候選人是獨立候選人，表示自行參選的華裔人士也增加，而這次選舉也出現的三位華裔女性候選人，候選人的背景分別是一位電台主持人，一位在金融服務界，另一位是家庭主婦，這是新風貌，也反映參與政治的熱潮得廣。詳見 鄧小穎陳麗文張桂蓮巾幗不讓鬚眉，三華裔女候選人競選邊緣議席 《澳洲新報》1999年3月19日。

⁷⁶ 團結黨在華人社區中舉辦大型籌款晚會，兩次共籌得將近十二萬元澳幣，過去未有前例。詳見相關報導，例如 團結黨籌晚宴盛況空前，得道多助籌經費逾10萬元 《澳洲新報》1999年3月15日。

⁷⁷ 在競選其間，團結黨傳出競選總幹事陣前請辭，另外在上次被推薦為排名第一名的李逸仙(Jason Lee)，選前宣布退出團結黨，團結黨要求華裔人士團結，仍是相當困難的事。詳見相關報導，例如 李逸仙宣佈退出團結黨，何沈慧霞則表示保持距離 《澳洲新報》1999年3月18日。李逸仙退黨事件餘波未盡，黃肇強厲責工黨誇大事態 《澳洲日報》1999年3月22日。前競選總監冰釋前嫌續助選，黃肇強期望選民全力支持 《自立快報》1999年3月27日。

兩名華裔澳大利亞人出任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州參院議員⁷⁸，分別代表工黨雪梨副市長曾筱龍和團結黨主席黃肇強，兩人新南威爾斯州的選舉中，都是以大力呼籲反對「一族黨」種族主義言論為競選的主要訴求⁷⁹。新南威爾斯省參議院原已有一名華裔參議員，她是香港移民何沈慧霞，參議員任期八年，這是澳大利亞議會首次有三名華裔人士同時擔任參議員⁸⁰。

除此之外，1999年4月9日澳洲華人李錦球出任墨爾本副市長，成為墨爾本市一百多年的首位華人副市長⁸¹，且在墨爾本市9位議員中，有他和蘇震西(John So)兩位華人議員⁸²。雪梨副市長之前為華裔曾筱龍，李錦球的勝出，使得這兩個人口最多、華人最集中的首府都市均有華人副市長出現，是難能可貴的成就。這些成就鼓舞了其他華人更上一層樓的雄心，1999年9月將要舉行的雪梨市市長選舉，目前已有幾個華裔人士表示有意參與角逐⁸³，今後華裔政治人物在澳洲政壇上將可望更加活躍。

除了直接參與公職人員選舉之外，華人參與政治的熱潮也擴大到其他層面，其他議題。例如過去有關澳洲國體宜採君主立憲制或共和

⁷⁸ 這次新南威爾斯州大選共選舉參議員21席位，平均每一候選人若能分配到4.5%的選票即可當選，而華人在新南威爾斯州約佔5%，當選機會比起聯邦選舉要高多了，但是能當選兩席仍是出乎預料的佳績。關於這次選舉情勢的分析，參考陳之彬 紐省大選的我見 《澳洲新報》1999年3月25日。

⁷⁹ 詳見 曾筱龍晉上院料獲委重任，將以制衡韓莘黨員為主要目標 《自立快報》1999年3月29日。團結黨存在的意義 《澳洲新報》1999年3月25日。都是旗幟鮮明地以反對「一族黨」為號召來競選。

⁸⁰ 詳見 兩名華人出任澳洲新南威爾斯省參議員 《中央日報》，1999年5月14日

⁸¹ 年逾70的李錦球原為墨爾本市市政議員，今年改選連任。詳見 澳洲華人李錦球出任墨爾本副市長 《華聲報》，1999年4月16日。

⁸² 如同其他地區的華人一樣，華人社群也有許多矛盾內部，以墨爾本市長的選舉為例，原先在爭取市長一職最有希望的兩位即是李錦球和蘇震西，兩位華裔相爭的結果，最後一位退出選局，另一位角逐失利，因此沒有爭取到市長職位，最後才由李錦球爭取出任副市長成功。詳見相關報導 李錦球當選墨爾本議員，決角逐市長有望成首位墨市華裔市長 《自立快報》1999年3月22日，墨爾本市長選舉爆大冷，李錦球退出蘇震西落敗 《澳洲新報》1999年3月25日。鷸蚌相爭，可悲可歎 談談華人團結的問題 《自立快報》1999年4月12日。

⁸³ 詳見相關報導，例如 何鍵剛擬角逐雪梨市長，不排除加入工黨可能性。《自立快報》，1999年4月20日。雪梨市長九月選舉，多人已摩拳擦掌，何鍵剛李潤輝潘瑞亮角逐 《自立快報》，1999年5月2日。

憲制的討論，華人並不算太關心，現在 1997 年剛成立的澳洲華人聯絡網則在選舉後開始推動舉辦針對共和主義的華人研討大會⁸⁴。另外，一個以聯合各地華人社團為主的政治遊說團體「全澳華人聯絡會」也在選舉後成立⁸⁵，可以說澳洲華裔社區已經動員起來。

最重要的是，少數族裔的聲音已經獲得兩大黨的重視，兩大黨的黨魁霍華德及畢茲利的演說中，都一再強調澳洲必須珍惜「多元文化」傳統，可以說兩大黨都意識到種族主義的言論只會帶來民族社區的反彈，以及亞洲各鄰邦的反感，對澳大利亞毫無益處。除了兩大黨之外，華人社區熱烈的參政聲音也使得民主黨也開始強調反應族裔社區的利益，也讓綠黨改變了其「零移民」（即移民人數控制到零成長）的政策。從大選的結果來看，表面上華裔參政熱潮所參與的兩次選舉都維持了原來的政府，然而民主政治的實質內涵已然改變。多元文化政策再度抬頭，和族裔社區不斷發出聲音，華人社區積極呼籲參政可以說不無關係。

結語：澳洲華人參政現象對華人研究的可能意義

最後，將以前述公民社會中的華人參政架構來理解九十年代澳洲華人參政現象。就澳洲華人在當地社會的基本條件以及九十年代以前的華人參政情況來看，九十年代華人參政熱潮是一大突破。澳洲華人不論就人口總數（四十萬）或是人口比例（百分之二）而言，在各國華人來說都是不起眼，而且由於是主要人口多是新近移民，成員背景複雜，整合程度低，加上許多華裔移民是為了逃避戰亂、政治紛爭而移民澳大利亞，或是專業人士及商業背景，政治性格較低，而且居住範圍散居各選區，要集中力量來支持參選有很大困難，這可以從九十年代以前的華人參政情況看出。以此為基礎來理解澳洲華人參政現況，堪稱是難能可貴的突破。

以公民社會的架構來理解華人參政現象，以第一層次而言，即可否有機會參選，很顯然過去華裔人士參政程度低，主要是前述的政治性格低所造成。就客觀的條件而言，澳大利亞的民主政治成熟，公民要參加政治，人為的障礙已經是減到最低，不論族裔背景，任何

⁸⁴ 該會強調澳洲華人要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已分別在雪梨及墨爾本辦理華人研討會。詳見 君主立憲制或共和憲制---你的選擇，華人研討大會墨爾本舉行 《自立快報》 1999 年 3 月 29 日。

⁸⁵ 該會於 1999 年 4 月 17 日正式成立。詳見 全澳華人聯絡會墨市正式成立，主席及秘書處將由各省輪流擔當 《自立快報》 1999 年 4 月 23 日。

公民祇要去登記競選即可參選，成立政黨也沒有任何困難，也是登記即可，這是為什麼澳洲選舉動輒上千人參選，近百個政黨登記，祇爭取幾十個席次的原因。從這個角度來看，澳大利亞提供充足的管道給公民社會互動發展，過去華人參政程度低不是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是主觀因素的自我設限，而最近兩次選舉(1998年聯邦大選及1999年新南威爾斯州大選)華人的參政熱潮，證明華人已經可以突破非政治性格的心理障礙。

第二層次是參選者是代表單一族裔利益，還是可以結合其他不同族裔和集團的力量。以澳洲華裔的參政表現而言，顯然華裔人士參選，其支持的群眾基礎是超越華裔社區的，以現任新南威爾斯州三位華裔參議員而言，曾筱龍代表工黨，黃肇強代表團結黨，而何沈慧霞原屬自由黨，後來退出自由黨成為獨立人士，三位的群眾基礎都是超越華裔社群。而以華人主導成立的團結黨，也是超越華裔的多元族群政黨，來自澳大利亞各主要的移民社區的成員都有。可以說以華人在澳大利亞的人口比及分布情況，如果支持的選民沒有超越華裔的範圍，要當選席次是絕無可能。在這方面也顯示了澳洲公民社會的特質，即雖然有主流社會的存在，但是主流社會也易於和少數族裔社會產生對話，同時主流社會和少數族裔社會一樣，本身都存在著多元的複雜性，因此易於在對話中產生新的旨趣與倫理，不必使社會行動的動員機制都必須訴諸族群等原初性連帶，是較成熟的公民社會。

第三個層次是當選與否，以澳洲華裔來看，成果是相當可觀，現在新南威爾斯州議會有三名華裔參議員，而墨爾本市的市議會中，在九位市議員有兩位華裔市議員，當選的比例相當高。在聯邦議會中，目前僅有陳之彬為華裔參議員，然而，在1998年聯邦大選僅差一點而競選失利的兩位華裔人士，分別是劉威廉(35歲)與李逸仙(27歲)，都是具有全國知名度的年青政治明星，未來在聯邦選舉應該有更多的華裔可以當選。有華裔代表當選民意代表，對於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互動關係可以有更直接的管道，可以將公民社會中不同族裔集團群體的意見和利益更直接的傳遞到政治社會，而政治社會的措施也有更流暢的管道可以得到公民社會的認可。

第四個層次是華人參政是否能以公民社會的邏輯，調整政治社會的意旨，即以從公民社會的參與，和主流政治權力對話，而非僅接受主流政治權力的安排或是遊戲規則，這是以公民社會來討論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即社會行動是否對於政治社會與公民社會的互相形

塑產生正面影響。這次澳洲華人的參政熱潮則是清楚地調整了主流政治權力運作的邏輯，突破了少數族裔必須接受兩大黨的政治模式，也表達了對文化多元主義的肯定，證明了文化多元主義是由公民社會爭取而來的，而非由上而下是主政者的恩賜，並且改變了主流社會對華裔社群一向逆來順受的刻板印象，可以說是一次公民社會參與的良好示範。

同時引發華人參選熱潮的原因也都是來自公民社會，「一族黨」的言論雖有種族主義的煽情成份，具有相當的危險性，但是其運作方式及影響仍是在公民社會的規範之中。而在華人方面，九十年代初期的華人參政者多是由在華人社區中熱心公共事務，奉獻心力者。到了「一族黨」興起以後，許多原來公共事務參與比較少的華裔人士，受到華人社區及團結黨的召喚，在明知當選機率不高的情況下，也願意參與競選，因此華人社群的參政熱潮的動力也是來自公民社會。等到華人關心政治及其公民權益的意識高張了之後，出現越多華裔人士願意繼續參與公共事務，乃至於投入競選直接參政，即使在「一族黨」種族主義言論已經不復有往日聲勢時，這時華人參政熱潮仍然持續加溫，可以說華人參政已經廣為華人社群普遍認可，有了自己的腳步和節奏，可以在澳大利亞這個「幸運的國度」(The Lucky Country)⁸⁶續繼向前邁進。

比較各國華人的參政空間，澳洲華人的參政熱潮是在相對而言體質良好的公民社會，配合特殊的時空，在很短的時間爆發出來，這種經驗也許很難在其他地區出現。然而以當初種族主義的言論在澳大利亞興起時，澳洲華人的處境即得到全球各地華文報刊的特別關注，這是由於對各地華人社區而言，種族主義都是最大的敵人。現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澳洲華人已經以具體的行動，改變了受主流社會擺佈的宿命，雖然現在還很難說種族主義言論在澳洲是否將成為過去式，但是華裔社群以更多的公民參與及直接參政的熱潮，調整了主流社會的心態與做法，把種族主義言論的氣焰壓制下來，已經明白地張顯出澳洲華人參政現象最重要的意義。澳洲華人的遭遇和回應，使我們有機會對於澳洲華人社會的現況進行理解與比較，從以上的分析可知，澳洲華人的參政熱潮，在思考在公民社會中少數族裔參政的模式，已經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華人參政經驗。

⁸⁶ 這裡借用 Donald Horne 的書名「幸運的國度」(The Lucky Country)用來指涉澳大利亞，參考 Donald Horne, The Lucky Country: The Next Australia and Time of Hope, 1963. 以及 Donald Horne, The Lucky Country Revisited. Melbourne: Dent, 1987.